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

旷新年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经典

第二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

旷新年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取了文学、人的文学、人民文学、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形象思维、文艺反映论以及文艺与政治等十一个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概念,采用了类似勒内·威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和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的描述方式,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梳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旷新年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7477-0

I. ①中… II. ①旷…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0770号

责任编辑:刘美玉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20.25 字 数:328千字

版 次: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产品编号:055919-01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文学观念的演变	15
第一节 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建立	18
第二节 文学的定义	27
第三节 文学的重新定义	33
第四节 文学政治化与文学工具论	39
第五节 文学“回复到自身”	45
第六节 反思“纯文学”	58
第二章 典型概念的变迁	65
第一节 典型人物	66
第二节 典型的共性与个性	71
第三节 典型的崩解	79
第三章 形象思维的命运	85
第一节 形象思维概念的引进	87
第二节 形象思维的第一次讨论	90
第三节 形象思维的第二次讨论	98
第四章 20 世纪文艺与政治	104
第一节 政治化的文学传统	104
第二节 “五四”文学与政治	107
第三节 30 年代左翼文学与文学的政治化	109
第四节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艺政治化	113
第五节 苏联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批判的影响	116

第六节 “文学回到自身”与文艺非政治化	120
第五章 文艺反映论的历史轨迹	124
第一节 文艺反映论的萌芽	127
第二节 文艺反映论的形成	129
第三节 文艺反映论的确立	132
第四节 反映论被工具论吞蚀	133
第五节 “自我表现”论对反映论的质疑	135
第六节 主体论对反映论的冲击	137
第七节 本体论对反映论的冲击	142
第八节 审美意识形态	145
第六章 “人的文学”话语的历史考察	147
第一节 人的文学	148
第二节 人性与阶级性	151
第三节 文学是人学	157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162
第七章 “人民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	169
第一节 普罗文学	171
第二节 工农兵文艺	172
第三节 新英雄人物	179
第四节 无产阶级工农兵典型形象	181
第八章 现实主义的流变	189
第一节 写实主义	191
第二节 新写实主义	198
第三节 现实主义	205
第四节 广现实主义	213
第五节 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	221
第六节 现实主义复归	225
第七节 现代主义的挑战	227

第九章 浪漫主义的旅程	234
第一节 “五四”浪漫主义	235
第二节 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否定	245
第三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输入与浪漫主义的再评价	249
第四节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252
第五节 浪漫主义的遁逝	261
第十章 自然主义的沉浮	265
第一节 “五四”时期：提倡自然主义	266
第二节 20 世纪 40 年代：关于客观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论争	273
第三节 1949 年以后：对自然主义的全面否定	277
第四节 新时期：重新评价自然主义	280
第五节 “新写实小说”与自然主义的正面登场	284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	288
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进	289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最好的创作方法”	292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	295
第四节 “两结合”创作方法	300
第五节 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再阐释	302
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5

绪 论

罗钢在《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文论与‘五四’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在思维方式、理论构架、基本术语等各个方面都面貌迥异，几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而在这一新的话语中，中国文学批评沿袭了上千年的道、气、理、趣、神思、风骨、意境等概念一下子都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各种主义，以及再现、表现、形象、典型等陌生的术语。这些陌生的主义和观念都无一例外地来源于西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们正是凭借这些西方的思想材料，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大厦。”^①理论工作离不开概念，一切理论工作都建立在概念的运用之上。与此同时，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凝结于那些反复出现的基本概念之中。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②罗兰·巴特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没有比划分其言语活动更必要的了。改变这种划分，移动言语，便是进行一场革命。”^③马克思说：“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实际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④有人从历史实践中总结出这样的规律：“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人们审美意识和艺术活动的深化，往往通过一些基本范畴的展开、演变、扬弃或赋予不同的解释表现出来。”^⑤夏中义说：

① 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第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②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罗兰·巴特：《批评与真理》，见《罗兰·巴特随笔选》，第12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④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 陈学超：《典型的迷惘与重建》，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1987年11月。

“只要潜心辨析,你总能从那沉静的术语外壳听出时代的呼唤或历史的回声。”^①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是“概念网”(conceptual net)的置换。科学家打破旧的范式,创立新的范式,通过新的概念网来观察世界,从而获得新的科学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进步就体现在概念的更替之中。威廉斯发现:“18世纪后至19世纪前半叶,一些今日极为重要的词汇首次成为英语常用词,或者这些词原来在英语中已经普遍使用,此时又获得新的重要意义。这些词汇其实有个普遍的变迁样式,这个样式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地图,通过它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生活思想变迁——与语言的变迁明显有关的变迁。”他说:“在我们现代的意义结构中,这些词的重要性随时可见。它们的用法在关键时期发生变化,是我们对共同生活所持的特殊看法普遍改变的重要见证。”^②文学风景的变迁也是如此:“文学理论教材中的关键词是文学观念的载体……这些关键词既是我们观照文学风景的窗口,又是反映一个时代文学观念演化的晴雨表。所以,文学界的风云变幻最先都会从关键词中反映出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也就是说,我国现代文论中的新话语和关键词,大都是伴随着文学新潮而引入的。”^③杨周翰指出:“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假说均基于这些理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生活,它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它有政治倾向性和教育目的……因此一些批评术语,诸如‘世界观’、‘倾向性’、‘进步性’、‘歌颂或暴露’、‘本质’、‘冲突与矛盾’、‘认识价值’,就经常出现在评论文章中,而批评家则主要探讨作家的生活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另一些术语,例如‘现实主义’、‘性格刻画’、‘典型’、‘体现’、‘栩栩如生’、‘细节’、‘浪漫主义和理想化’等,则常用来探讨作品的美学形式。”^④“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中发现了一套与之迥然不同的术语……在这些特征中,最主要者就是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诸如‘肌质’、‘模式’、‘范围’、‘平面’、‘结构’、‘构成’这类词已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⑤有人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概念系统。从德谟克利特关于文学的残篇断语到威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从《论语》中文学概念到当代的‘文学’概念,其间是一部规模宏伟的文艺概念的生成史、变异史和演进史。”^⑥

① 夏中义:《新时期文艺心理学批判》,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

②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导论》,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 古风:《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001年9月。

④ 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见《镜子和七巧板》,第22-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⑤ 汪瑰曼:《文学理论概念的重整》,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现代文学又称为新文学,一个重要和显著的特点就是与西方文学的特殊关系,即西方文学概念的大规模输入和西方文学的感受方式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感受方式。“现代文学”一词最早见于1917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所载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之趋势》中开篇即说:“‘现代中国文学’系指所谓‘新文学’。”^①朱自清说:“中国的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另起炉灶的新传统,是现代化的一环。”^②王力甚至断言:“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③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所谓“走向世界文学”,也即大量吸收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的过程。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指出:“汉族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反动政权的同时,曾经不断的学习世界上各族人民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因之,汉族人民已经进入世界的范围,使文化现代化了。这种情形就反映在现代汉语的外来词里。”^④

语言、词汇的变化,在中国现代尤其是外来语的输入是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变化的最显著的特征。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言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言语言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⑤王蒙也说:“知识更新,观念更新,以及一些新学说新思潮的引进,莫不把一批新名词夹带进来。”^⑥

概念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图腾,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这些具有不同命运的概念的集合,构成了一幅概念的地图。通过它们,我们因此可以去把握一个时代的特点。特定概念的产生、扩张与消失构成了思想的历史。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概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在20世纪,我们发现许多概念兴起了,同时许多概念消失了。随着这些概念的兴衰变迁,我们的文学经验、文学理解的

① 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之趋势》,载《晨报副刊》1925年3月25日。

② 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11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③ 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117页。

④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第139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⑤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111-11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⑥ 王蒙:《从新名词轰炸说起》,载《光明日报》1985年12月19日。

方式、文学的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精神结构和世界面貌也发生了变化。从《诗大序》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钟嵘的《诗品》到英美的新批评,从陆机的《文赋》到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完全不同的。刘勰说:“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①追踪这些概念,成为我们把握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一个方便之门。

1840年西方的入侵,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天朝”崩溃,从此中国被迫走向现代世界,并且逐渐转变为现代中国。从晚清开始,随着“国家”、“议会”、“立宪”、“人权”、“民主”、“自由”、“科学”这些概念和事物的出现,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始发生深刻的以至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象鲁迅那种“‘物竞’‘天择’也出来了”^②的在新知识同时也是在新世界面前的兴奋和激动。施蛰存说:“西方文明是由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护送进来的。我们先有大炮、毛瑟枪、轮船、火车,其次有了电报、电话、马车、瓦斯灯。其次有了纸烟、番菜、洋袜、洋布。其次才有《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巴黎茶花女遗事》。”^③从晚清开始,现代性最核心的概念“国家”、“个人”伴随着现代启蒙运动开始出现和传播,同时作为启蒙运动的媒介和载体的大众媒体——白话报刊开始兴盛。这种现代大众媒体、现代新知识、新语文和新名词的涌现是共生的互为一体的。

近代以来,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概念与词语的急剧变化以及崩溃与重建的时代,是旧词语退场和新词语登场的时代。在晚清,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国民、立宪、国会、自由、民权等新名词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大量出现和流行。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论及晚清“诗界革命”的时候,曾经谈到“新诗”与“新名词”之间的关系。“五四”时期,科学、民主、个人等新名词通过《新青年》杂志广泛流布,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和1929年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广泛传播中,《文化批判》月刊专门开辟了“新辞源”的栏目,在《思想》月刊开辟了“新术语”的栏目。成仿吾在《文化批判》杂志上提出了“理论斗争”的口号。在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革命文学论争和革命文学的倡导过程中,最明显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新名词和新概念的大量出现,在《文化批判》创刊号的“新辞源”的栏目里就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奥

①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第7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②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2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③ 施蛰存:《1900年以后的近代文学》,见《北山四窗》,第3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新名词,并且因此与“五四”的知识产生了深刻的断裂,形成了一场明显和重要的“思想革命”、“文化批判”和“理论斗争”。由于新概念的大量出现,甚至于有人编辑出版了《新主义辞典》。晚清、“五四”、20世纪2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知识、文化、文学发生崩溃与重建之际。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语言的革命和新陈代谢的现象。现代以来,“新名词”总是不断地创造着“新时代”,“新时代”不断地带来“新名词”。从晚清开始,“新知识”与“旧知识”、“新思想”与“旧思想”、“新文化”与“旧文化”、“新人物”与“旧人物”、“新话语”与“旧话语”的对立,往往就是“新名词”与“旧名词”的对立。这同时也是新的意识形态与旧的意识形态、新的世界观与旧的世界观之间的对立。通常,一个时代取代了另一个时代,是一批名词驱逐了另一批名词,一些概念覆盖了另一些概念,一种说法战胜了另一种说法,一套话语压倒了另一套话语,一个知识体系取代了另一个知识体系。每一种新的名词和概念的到来,产生和创造了新的知识和问题,同时也改变和代替了旧的知识和问题。

在“五四”时期,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是现代/传统、个人/国家、民主/专制、科学/迷信、白话/文言,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视框,同时也造成了独特的风景。在文学上,白话文学和写实主义成为了我们认识文学的基本尺度。也正是在现代的门槛处,产生了“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的概念。经过1928年的“文化批判”,“新文学”产生了新的分化,产生了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如果说,在“五四”,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是建立在“国民性”和“人性”以及“个性”的基础上的;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则离不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结构。同时,在“五四”,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离不开“人性”、“情感”、“创造”这样的概念;而到了30年代,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则紧密地与“阶级”、“政治”、“反映”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概念群有力地构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不同认识,有力地塑造了不同的世界图景。它们不断地摧毁旧的知识 and 经验,并且不断形成新的知识和经验。晚清以来,我们迅速地 with 旧的知识、概念和名词告别,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不断地与不同的知识和世界观进行决裂。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场自觉的“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知识的胜利。在《文化批判》杂志上发表的李初梨的

《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和朱镜我的《德模克拉西论》对于构成了“五四”知识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科学”和“民主”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建立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科学知识。《文化批判》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地位和作用相当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但是由于《文化批判》杂志的出版时间要比《新青年》短得多,所以《文化批判》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实际上,正如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对于封建礼教的批判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宣传和传播构成了“五四”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文化批判》同样通过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宣传,构成了无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如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所描述的那样:“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①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由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文学组织生活”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观念。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包含的这样一个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的文学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的文学思想。他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在中国现代,小说以及文学成为了“组织生活”即社会重构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的生活是由文学“组织”起来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即“新中国”的想象和建构。

一方面,需要历史地理解文学的概念、命题、思想、知识,而不是将概念、命题、思想、知识视为不言自明的,也就是说要将不同的文学概念置于历史之中来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不仅要將概念、命题、思想和知识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而且要作为一种构成性的力量,它们作为一种活的力量参与和作用于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需要将概念历史化,而不是相反将概念抽象化和本质化。我们要将概念具体化,没有任何概念是永恒的和超时空的。概念经过不断的阐释而生活于历史之中,概念的不断流变构成了思想和知识的脉络,它们既有连续性,

① 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见《文艺讲座》第1册,第93页,1930年4月。

②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

又有非连续性。它们不断地转换、变化、生长,直到衰亡和消失。每个概念具有它不同的命运、际遇和历史。我们将概念相对化,每一个概念在一定的时空之内具有它的合理性。某一个概念可能曾经支撑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和知识的大厦,但是,也可能曾经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大厦顷刻间发生了动摇,甚至土崩瓦解,只剩下一片瓦砾废墟,使我们惊叹那个时代是怎么建筑起来的,竟然曾经能够存在。

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指出,每个时代文学有不同的、不断变化的规范,其评价标准不断变化,同时其语义内涵实际上也在不断变化。他以“诗言志”与“诗缘情”为例:“即如诗本是‘言志’的,陆机却说‘诗缘情而绮靡’。‘言志’其实就是载道,与‘缘情’大不相同。‘诗言志’这一个术语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原也是一种尺度;后来得到公用而流传,就成为一种标准。说陆机用了新的尺度,是对‘诗言志’那个旧尺度而言。又如南朝文学的求新,后来文学的复古,其实都是在变化;在变化的时候也都是用着新的尺度。”^①王瑶在《谈传统批评习语的含义辨析》中指出:“文学理论批评,如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有它的传统和继承关系。”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既有继承,也有变化。“诗言志”在各个时代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按照闻一多《歌与诗》和朱自清《诗言志辨》的分析,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它的本意是记忆,因此,在先秦时期,“言志”的含义和“载道”差不多;魏晋以后,才逐渐扩大了“言志”的内涵,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就是那个时代对诗的理解,于是“言志”一词的含义便逐渐与“缘情”合流,便成“抒情”的了。到了“言志”的含义被一般理解为抒情以后,才又起来了“文以载道”的说法^②。在茅盾看来,“文化大革命”所谓“文艺新纪元”也并非什么新的创举:“了解历史上存在过的创作方法和源流,我们就不难看出,‘四人帮’自己吹嘘为‘创造性发明’的什么‘三突出’、‘三陪衬’一类的创作‘规则’,可以说是从历史博物馆里偷来的古典主义的唾余:妄图强迫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去服从某些人为的僵化的艺术框框。”^③

普实克曾经指出,中国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剧烈的、根本的变化,其变化之巨使人很难相信这新旧两种文学是同一个民

① 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13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② 王瑶:《谈传统批评习语的含义辨析》,载《文艺报》1961年第5号,1961年5月。

③ 茅盾:《漫谈文艺创作》,载《红旗》1978年第5期。

族的产物。他说：“在一般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题目，即亚洲各国的革命变化所导致的亚洲新文学的诞生。亚洲新文学的共同特征是，按照一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向当代欧洲文学看齐，并吸取欧洲文学的成就来帮助它们解决在各自的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这一历史进程的速度以及它相对短暂的时间界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机会来判定：文学中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首先应该在文学自身中去寻找，还是应当更多地归因于文学之外的动力、特别是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分析种种文学现象的不同特征。”^①

刘禾曾经提出“翻译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的产生和演变与西方以及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朱自清在《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中说：“现在所谓‘语法’或‘文法’，都是西文‘葛朗玛’的译语；这是个外来的意念。”“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曲为比附的地方大概是免不了的；人文科学更其如此，往往需要经过一个比附的时期，新的正确的系统才能成立。”^②他在《诗文评的发展》中说：“‘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清末我们有了中国文学史。‘文学史’虽也是输入的意念，但在我们的传统中却早就有了根苗。”“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方面，极其错综复杂。”^③

我们关心一些概念怎样崩溃，怎样被摧毁的过程，因为这些概念被摧毁和崩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观”的崩溃和被摧毁，一种话语的失效、退场的过程。同时，这些概念也不是孤立的，一个时代的概念构成了一个概念的家族和群落。这些概念的变化实际上是其理论和话语的兴衰。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创造和建立，代表着一种新话语的产生和成长，也即它的逐渐辨析和成型的过程。其过程在一开始是石破天惊、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强烈新鲜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为异端对于原来秩序的反抗和挑战。

在《马桥词典》后记中，韩少功曾经极端地写道：“每一个人都需要一本自己

①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以中国文学革命为背景看传统东方文学同现代欧洲文学的对立》，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第8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 朱自清：《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56页。

③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3-35页。

独特的词典。”不同的概念构成了不同的地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地理经验，每一个时代都构成了自己时代的地图和“世界地图”。实际上，不同的文明、时代、民族国家、阶级、社群和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地图，正如他们拥有自己不同的知识一样。每一个时代也都不断地重新绘制自己时代的地图。

现代文艺批评建立在各种各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线索和脉络。鲁迅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①鲁迅在《伪自由书·透底》中说：“从前反对卫道的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

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将刚刚过去的时代称为“闭关锁国”的时代，对文学理论批评的现状极为不满。王元化在《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中回忆说：“我在抗战前开始接触进步文艺理论，最初读到的文艺理论入门是维诺格拉夫的以群译的《新文学教程》……从维诺格拉夫，经过季摩菲耶夫，直到今天出版的许多文学概论，基本上都是小异而大同，几十年来在体系上仍然是墨守原来的框架，涉及到的文艺问题还是那些谈了又谈毫无新意的老问题。采用的范畴和概念也仍是十分贫乏的几乎人人熟悉的老一套。”“现在的文学概论，并没有把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融进内容中去……中国古代文论中大量论述了想象问题，如《文赋》、《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以及后来的诗话词话等。但由于过去苏联这方面的著作不谈想象，而我们的文艺概念也就不去碰它。”^②王蒙曾经感叹：“我常常感到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忧虑：我们的后代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论争吗？声势浩大的辩论，洋洋大观的文章，马拉松式的争执，随风而变的、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就必须强调不同侧面的论点，费了偌大的代价而得到的结论却只不过是早已被公认的常识……”^③李陀在《概念的贫困与批评的贫困》中抱怨：“检讨近几十年来的文艺批评，我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造。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很少看到一篇批评文章能提出新鲜的概念，并使用这概念发表新鲜的见解。”^④吴亮意识到：“当代文学是如此的变幻莫测，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以往的传统明晰概念很难与之榫合。人们已经倾

① 鲁迅：《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见《鲁迅全集》第5卷，第428页。

② 王元化：《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载《文汇报》1982年6月8日。

③ 王蒙：《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载《十月》1980年第1期。

④ 李陀：《概念的贫困与批评的贫困》，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向于认为,当代文学的演进,必然要扩展乃至否弃已有术语的本来涵义。”^①刘再复在《文学的反思和自我超越》中指出:“近年来,文学上的反思热情显然从文学创作领域涌入了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文学研究者对文学自身的反思,即对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

罗兰·巴特说:“一个作家……他应具有哨兵式的坚韧,他处在所有基地对话的交叉点上,以庸俗性(triviale)同理论的纯洁性保持联系。坚持抵抗总的说来,就是全力保持对任何偏向和期待力量的反抗。正因为坚持反抗,写作才导致自我回避。权力占有写作的快乐,就像占有一切快乐,以便操纵它们并使之同时成为一种产品,这并非邪恶。”“即使当人们为寻求快乐而提出要求,也还有一种威胁性的声音,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得到承认的解放行动,社会的、文化的、艺术的、性的解放行动,都在某种权力对话的形态下得到传播。我们只夸耀、显示已被摧毁的,但不能由此看到在别处需要摧毁的。”^②

现代文学理论的诞生是西方文学理论引进的结果。在20世纪的中国,由于文学地位的上升,造成了普遍的文学风气。葛兰西说:“就像德·森克蒂斯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一书中敏锐地提到的那样,启蒙运动本身是一场宏伟的革命,它以一种统一的意识的形式,给全欧洲提供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精神国际,这个国际对平民的所有灾难和不幸是敏锐的,它为后来法国的流血起义作了最好的准备。”^③文学理论的生产在整个文学活动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理论斗争的活跃,或者说理论斗争在民族国家内部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理论斗争的活跃成为现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现象。

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时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现代的学术发展与现代的学术体制有着紧密的关系,即使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最终也托庇于学校。北京大学设立了研究所,各研究所之任务有研究学术、审定译名、译述名著、介绍新书、

① 吴亮:《典型的历史变迁》,载《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4期。

② R.巴特:《文学符号学》,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5期。

③ 葛兰西:《社会主义和文化》,见《葛兰西文选》,第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